

澎湃出品
THE PAPER

改革

十六位学者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

给亲历者

一个追忆四十年的出口

给90后、00后

一个了解四十年的入口

澎湃研究所◎编著

中国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改革 中国

十六位学者论
改革开放四十年

澎湃研究所◎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改革中国: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四十年/澎湃研究所编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ISBN 978-7-208-15443-8

I. ①改… II. ①澎… III. ①改革开放-概况-中国
IV. ①D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19213 号

责任编辑 罗 俊

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

改革中国

——十六位学者论改革开放四十年
澎湃研究所 编著

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1/32
印 张 5.5
插 页 2
字 数 105,000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5443-8/D·3280
定 价 32.00 元

1

忆 往

我的1978 / 005

周晓虹 /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

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/ 020

赵鼎新 /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

激情年代的改革 / 027

张 军 /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

一家子教我的“改革” / 052

刘守英 /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

2

宏 论

改革下一程的三大重点任务 / 063

田国强 /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

“静悄悄”但“革命性”的社会变迁 / 070

吴晓刚 /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

中国拥抱全球化的40年 / 078

高 柏 /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

3

社 会

人口模式变化下的中国老龄化 / 085

彭希哲 /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

留学与海归背后的制度变迁 / 094

崔大伟 /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

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机遇与启示 / 104

王 丰 /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

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难题 / 110

张 斌 /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

喜忧参半的医疗改革 / 115

朱恒鹏 /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

被计算机改变的人生 / 126

沈向洋 /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

4

政 治

中国政府治理的变革与现代化 / 135

周黎安 /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

廉政建设的演变之路 / 152

朱江南 /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

政商关系的中国道路 / 162

耿曙 /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文科百人计划研究员

后 记 / 171

1

忆 往

我的1978 / 005

周晓虹 /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

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/ 020

赵鼎新 /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

激情年代的改革 / 027

张 军 /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

一家子教我的“改革” / 052

刘守英 /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

2

宏 论

改革下一程的三大重点任务 / 063

田国强 /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

“静悄悄”但“革命性”的社会变迁 / 070

吴晓刚 /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

中国拥抱全球化的40年 / 078

高 柏 /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

3

社 会

人口模式变化下的中国老龄化 / 085

彭希哲 /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

留学与海归背后的制度变迁 / 094

崔大伟 /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

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机遇与启示 / 104

王 丰 /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

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难题 / 110

张 斌 /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

喜忧参半的医疗改革 / 115

朱恒鹏 /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

被计算机改变的人生 / 126

沈向洋 /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

4

政 治

中国政府治理的变革与现代化 / 135

周黎安 /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

廉政建设的演变之路 / 152

朱江南 /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

政商关系的中国道路 / 162

耿 曙 /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文科百人计划研究员

后 记 / 171

1

忆 往

我的1978 / 005

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/ 0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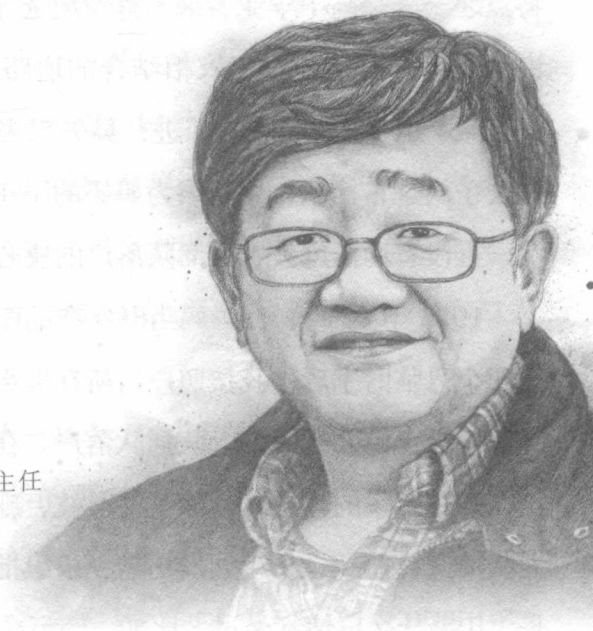
激情年代的改革 / 027

一家子教我的“改革” / 052

我的 1978

周晓虹

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



尽管我作为志业的社会学强调客观中立，但在 40 年后下笔谈及当年那场意义广远的高考改革，我脑子里最初顽强地浮现出的标题却是：“1978 年颂”。在这场改变了几十万并陆续改变了上百万人命运的高考改革过去 40 年时，当我们这些受惠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，并因此改写了自己人生轨迹的人陆续进入花甲或古稀之年时，这场伟大的变革所具有的社会意蕴确实值得人们探讨和称颂。

1975 年，我高中毕业。尽管狂飙突进式的“革命”已经过去，但我们这些中学生依旧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激进特征。激进的

特点之一就是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山下乡，当时流行的说法是：是否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”是革命与否的“试金石”。最初，我与同班的邹进、吴矢想去河南兰考插队，后来邹进去了内蒙古插队，尽管因为妈妈的阻止我未能与邹进同行，但我一直没有动摇过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决心。

1975年12月，在妈妈当时所在的南京无线电原件七厂当了三四个月临时工后，我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，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插队落户。在农村插队的两年，第一年在知青聚集的林业队，除了剪桑枝、施肥、培土，也常常会被大队抽调打些杂，从写大批判稿、组织批判小分队到担任专案组长，几乎什么事情都做过。比如，我所负责的专案组，处理的是彭家边13队伪保长儿子的奸淫案，时年我刚刚19岁，对男女之事不甚知晓，但凭着正直和热情把嫌犯从其他知青将其吊起的房梁上放下，苦口婆心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劝说其到凌晨3点，促使其低头认罪。记得回城时和父亲谈起，父亲也大吃一惊：“你们大队怎么让你们干这事？”当时我还反问：“这有什么不能干？我干得很好。”其实，所谓“干得很好”，在当年的秋天就证实是一场冤案。在“农业学大寨”工作队来了以后，发现真正的元凶其实是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几年以后，在“伤痕文学”的大潮中，已经在南京医学院医学系读书的我据此写成了小说《天罪》，以控诉“文革”中盛行的出身论。可以说我对“文革”的反思最早始于这起我参与制造的“冤案”。

在林业队劳动，虽然深秋剪桑叶枝时曾连续几天满手都是血泡，但比起到下面的生产队干农活，毕竟还是轻松的差使，起码一天三顿不用自己烧饭吃。不过，好景不长。自第二年秋天我参加“农业学大寨”工作队，去比较贫困的第11生产小队蹲点三个月，再留在那里当队长后，日子就苦起来了。那年我刚刚19岁，不但天天要和农民同劳动，而且还担负起了管理133口人吃喝拉撒睡的重任。

我记得当时我们大队一共有70多名知青，其中有几个插队快10年了，来了三年五年的更多。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，加之当年的我刚到农村插队不过两年，并且自以为“志向远大”，所以一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的第二年即1977年秋天听说高考制度改革，几乎各种人都能自由地去报考离开农村时，那腔“革命热情”堵在胸中还是几天没有回过劲来。我后面要说到，因为这腔还没有化的“革命热情”，或者说因为多少有些“骑虎难下”——我那时小小年纪，已是生产队小队长、大队团支部书记、全县农业学大寨“积极分子”——在后来的考大学复习中倒帮了我大忙。

记得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，就决定在当年废除“文革”中推行的所谓“自愿报名，群众推荐，领导批准，学校复审”的大学招生的“十六字方针”，在废除高考10年后恢复了高校考试入学制度。因为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时已是这一年的7月，所以这一年的改革到9月才真正定调，而通过新华

社、《人民日报》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出新闻，更是到了初秋的10月。我记得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惊愕中报的名，因为大学10年没有公开招生，那一年报名的人一共有570万人。用我们后来戏谑的话说，十年的“陈渣烂谷子”一年都翻了出来。单单我们一个公社，连知青和回乡青年，报名的人竟有500人之多！

几乎所有的知青，在报名后都立即回了南京城。显然，一来城里资料好找，二来一日三餐父母都包了下来，三来可以找中学母校的教师辅导。说句实话，我看到别人都回了家，心里自然也十分渴望，家里毕竟要舒服多了。不过，因为前述“骑虎难下”的原因，也因为队里的农民确实不愿意我回去，我只能选择留下。不过，我心里清楚，虽然我中学时代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，但一者我们那个地处城乡结合部的中学教学质量一般，二者毕竟几十个人才能考上一个，我再像以前那样和农民一起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、不玩命复习是肯定不行的。所以，我记得几乎是在报名的当晚，我就召集队委会开会，告诉他们，既然你们都不希望我回去，那我就自己派工了，从现在起我负责看管村边田头的鸡鸭，不让它们吃稻子。这活以往总是派老年妇女去做的，这年成了我的“专利”。

这活干了半个多月，我每天都坐在村边与稻田交界的地方，赶一阵鸡鸭，做上几道数学题。到了11月，天冷了，稻子也都收割了，看鸡鸭的活自然是无法干了。我就又给自己“派活”，

改成看场。从稻子收割入场，到脱粒下来交粮或入库，前后看了有近2个月。我们那个生产队，因为都是丘陵山地，所以虽地处锦绣江南还是穷得厉害，干一整天工分也不过2角7分钱，所以以前的每一茬干部都多吃多占，农民小偷小摸的更是不计其数。我当工作队员时，小队会计曾向我“汇报”，说张三家偷过什么，李四家偷过什么。我当时年轻，既直率单纯，又多少有些恶作剧的心理，随口问道：“那你呢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脱口答道：“那，都有一点的。”正因为这样，弄的农民对除我以外的任何本村人都没有信任感；也正因为这样，队里的打谷场和仓库不敢建在村旁边，而是建在了300多亩丘陵地的中央——以免晚上哪个人想偷东西三步两脚就溜过去，土坯垒的仓库撬起来一点都不费劲。

我每天晚上6点上工。吃了饭，自己背着装满书的书包去仓库，迎面是收工的农民。到了仓库，最后走的农民对我做完交代，我就走进仓库，将一张大桌子抵在仓库门口，盯着场上的稻谷，然后铺开书本纸张，点上煤油灯，专心致志地复习迎考，好在队里那条一有动静就乱叫的狗也可以帮我看场。我们村的打谷场原先是一片坟地，后来推平了东面一半，北建仓库、南作打谷场，西面一半还是坟地。每到深夜，嗖嗖的北风，吹打着坟地里的灌木飒飒作响，门外那片景象真称得上是“落日无人松径里，鬼火高低明灭”。我是在空军的飞机场里长大的，跑道边即是大片无人管理的坟地，到了晚上就是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玩打

仗游戏、“官兵捉强盗”的绝佳“战场”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虽然生得远不算强壮，但胆子一向都大得惊人。这样一来，这和“林冲看草料场”十分相似的境况，对我来说非但一点都不灰暗，更谈不上残酷，反而为我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复习场所。我在那里每夜可以一口气看上12个小时的书，到早上6点农民起来出工的时候，就背着书包回去，在房东家吃了早饭睡觉，一觉睡到下午两三点钟起来后再看两三个小时的书，吃了晚饭和队委交代几句就再去看场。这样，每天的复习时间可以保证在15个小时上下。

后来想想，我真应该感谢前述“骑虎难下”的局面，因为无法回城，虽然少了向中学时代的老师请教的机会，少了和同时报考的同学相互切磋的机会，但却充分获得了时间和精力。尤其是晚上的12个小时，真是除了和坟地里的鬼去聊天，连个搭理你的人也不会有。这种“孤独求学”的好处后来很快体现出来：1977年的高考，因为报考人多，江苏分初试和复试两轮筛选。和我同一个知青户的好友施跃，初试分数比我高，但后来复试却名落孙山，到第二年才考上南京工学院。我觉得毕业于南京四中的他，基础绝对不比我差，可能还是因为回城复习，分散了精力的缘故。

我在中学里学习不错，但以文科见长，本来应该考文科才称得上得心应手。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龙传贤先生，是1945年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，但一生贫病潦倒。1972年，龙先生从南

京一中“下放”到我们那个处在城郊结合部的光华门中学任教。他和我们的化学教师，也是中央大学毕业，并且同样从一中“下放”来的丁又川先生（丁老师的公子丁方，现在是中国著名的画家），保证了我们在那个不学无术的年代、地处城乡结合部的边缘中学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充分的激励（1977年，我们那一届5个班只有我们一个班有人考上大学，而且是一届5个）。因为爱戴和崇拜自己的老师太甚，也因为内心的悲凉，我记得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，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去做，就是不当中学老师！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，我不敢考文科，毕竟考不上南京大学这样一流大学的文史哲三系，充其量最好的就是上师范大学，毕业以后当中学教师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选择了考理科，在后来选填志愿时又填报了医学的缘故。那时的我尽管在农村已经“经风雨、见世面”，但内心还是十分的单纯，认为鲁迅、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的，以为选择医学能够为今后从事文学留下一条退路。

初试是在自己公社的中学里考的。那年头政治挂帅，包括高考这样的事情也都是政治任务，所以考完以后自己上没上并不通知你本人，我记得是大队书记去公社开会才知道的。书记回来以后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大队初试有三个人通过了，这在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里算是名列前茅。初试之后，大概又过了近一个月，复试开始了。那年只考4门课，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理化。考试的地点在我们那个片区的淳化中心小学，记得第一场数学考试结